

西域重镇与唐诗繁荣

胡可先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杭州)

摘要: 在西域漫长的丝路沿线, 出现了很多丝路重镇, 演绎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西域重镇与唐诗繁荣有着重要的关联, 集中表现四个方面: 一是敦煌唐诗的多元融合, 二是吐鲁番文书成为丝路重镇的唐诗印记, 三是安西四镇彰显出西域唐诗的边缘活力, 四是西域文化融入长安的唐诗书写体现了唐代中央与边疆广泛交流和融合。

关键词: 西域重镇 唐诗繁荣 敦煌 吐鲁番 安西四镇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而对于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的交通道路。到了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域及中亚、西亚等地的客商聚集于此。一个世纪以来, 有关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 成就巨大, 无论是敦煌莫高窟、交河故城、高昌遗址、龟兹石窟, 还是西安的大唐西市遗址, 都昭示着人们加深和改变对于中古历史的认识, 而我们对唐代边塞诗为代表的中古文学, 借助于丝路考古, 也可以解决不少重要而且疑难的问题。

丝绸之路分北、中、南三线, 均由长安出发, 至甘肃张掖、武威会合, 经酒泉、瓜州至敦煌, 然后从玉门关、阳关出西域, 再通向很多国家和地区。至今考古遗址遍布中国的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各国。在这漫长的丝路沿线, 出现了很多丝路重镇, 演绎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举其要者即有: 长安、洛阳、兰州、武威(凉州)、酒泉、张掖(甘州)、陇西、敦煌、瓜州、哈密(伊州)、吐鲁番、乌鲁木齐、北庭、龟兹(库车)、碎叶、喀什(疏勒)、于阗(和田)、固原(原州)、楼兰、若羌。这些丝路重镇, 联系着周边的关镇、古城和烽燧, 联系着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 至今还留下了很多考古遗址。本文集中于西域重镇与唐代文学的关联研究, 通过考古发现与所留存的文学和文化的钩稽, 呈现出唐代文学的在丝路重镇的发生与传播情况, 展示出唐诗的繁荣盛况。

一、敦煌唐诗的多元融合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明珠，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唐代统一天下后，丝路畅通，于敦煌置沙州，敦煌也达到了鼎盛阶段。但随着安史之乱的兴起，唐帝国失去了对于西域的统治，敦煌也陷于吐蕃。直至晚唐以敦煌为首的河湟七州归于朝廷，唐又于此置归义军，因而敦煌地区经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种变化。因为政治、军事、交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促进，敦煌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敦煌石室的发现，保存于敦煌的各种写本文献重新问世，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加以近年来新发现有有关敦煌人物的石刻碑志，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敦煌的认识。

（一）写本时代的诗歌文本

敦煌石室打开后，出现了很多诗集写本残卷，前辈学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至2000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的出版，集敦煌唐诗写本辑集与研究之大成。该书以写本叙录和作品辑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上下两编，上编共校定诗集63种，诗1401首，下编辑录零散诗篇524首，二者合计1925首。大量佚失已久的诗作得以发现，很多散见零篇得以缀合，各种文字复杂的诗钞经过校订。作者基于写本的原生状态以确定整理的标准，关注文学的发展以进行叙录的撰写，突出了“写本时代”诗集的特点，是精审的文献整理与深层的诗学探源相结合的示范著作，对于唐诗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伏俊琰先生说：“敦煌所存中原文人诗作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作品时代上以初盛唐诗作为主；题材上以和边塞相关的边塞、军旅、闺怨等内容为主。这两个特点出现的原因也比较明显。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渐为吐蕃占领，敦煌与中原的交流中断，盛唐时期商旅往来的盛况不再出现；从抄写人的角度看，由于大多数诗卷是地处边疆的敦煌士人抄写的，特别关注边疆题材也是很自然的事。”^①在敦煌诗集残卷中，真正到过河西的诗人如岑参、高适的诗歌较多，是因为敦煌地区文人对于岑参、高适等诗人诗作更为熟悉的缘故。此外，从敦煌诗集残卷，更可以看出唐诗在西陲传播的情况。

（二）著名诗人的诗歌抄卷

敦煌诗集残卷中有很多著名诗人的作品，其中以李白、岑参、高适最为典型。即以李白诗为例，该集所选李白诗四十三首，开头为《宫中三章》，题“皇帝侍文李白”，四十三首诗题：《宫中三章》《山中答俗人问》《阴盘驿送贺监归越》《黄鹤楼送孟浩然下惟扬》《初下荆门》《千里思》《月下对影独酌》《古乐府战城南》《白鼻騮》《乌夜啼》《行行游猎篇》《临江王节士歌》《乌栖曲》《长相思》《古有所思》《阳春哥》《白紵词三首》《飞龙引二首》《前有樽酒行》《古蜀道难》《出自蓟北门行》《陌上桑》《紫骝马》《独不见》《怨哥行》《惜罇空》《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古意》《江上之山藏秋作》《送族弟瑄赴安西作》《鲁中都有小吏逢七朗以斗酒双鱼赠余于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梁园醉哥》《送程刘二侍御及独孤判官赴安西》。该集对于李白研究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其一，在唐人选唐诗中，是选李白诗最多的，足见编者对于李白诗的重视。在所选的诗中，古体、近体、杂言都有，堪称众体

^① 伏俊琰《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作》，《丝绸之路》2012年第12期，第32-33页。

皆备。这与《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等偏重一体者不同。尤其是将古乐府编为一类，共有二十四首。可以推测，这个选本不一定出自文人，而是像敦煌曲子词一样，出自民间。因为乐府接近口语，尤其得到大众的喜爱，以至于辗转传钞而藏于敦煌。从中也可以推测出李白乐府诗在唐代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二，从所选李白的四十三首诗中，可以推知唐人对诗歌体裁的分类情况。写本选李白诗共有三十七题，其中有九首入陶翰之下，大概是误钞所致。即以李白名下的二十八题看，编者按体裁分类是很明显的。其三，是该集所选诗歌，具有极大的校勘价值。《鸣沙石室佚书目录提要》以此卷与《李白集》校勘，并云：“太白《胡无人》篇，卷本无末三句；《临江王节士歌》《陌上桑》《鲁中都有小吏逢七郎以斗酒双鱼赠余于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三篇中，卷本亦较集本各少二句。《古意》篇（今集题作《望庐山瀑布》），则卷、集全异者四句；《题赵四篇》，集本八句，卷本则四句，而四句之第三句亦全异，第四句与校注中之一本合。《独不见》篇，则除末二句但异一字外，其余均不同；《高常侍信安王出塞》篇，以卷本校集本，则后半先后错列者四句。《太白集》在生前已家家有之，或传写异同，或中间改订，卷集互歧，理所应有。”^①以李白为代表的诗歌钞卷，不仅对于李白诗歌的内容与艺术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通过钞卷的整理、缀合、校订，探讨李白诗集的编纂、还原李白诗歌的创作原貌都极具价值。

（三）本土诗人的创作留存

敦煌文献中还值得重视的是敦煌本土诗人的诗作，著名者有《敦煌甘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我们举《龙泉神剑歌》为例加以阐述。《龙泉神剑歌》是金山国文学的代表作品。对于这首诗歌的主旨，前贤已经有了不少关注。王重民认为：“《白雀歌》多陈瑞验，此则专颂武功，盖统一八州以后，国基已固，方有余力以对外，冀恢复张议潮时代归义军十一州之地域也。然则此歌又是一篇金山国武功纪盛矣！”^②颜廷亮则认为：这首诗是“一篇鼓舞金山国朝野上下士气，以夺取抗击甘州回鹘进犯的最后胜利之作”，“作者从天意、人事、以及外援等几个方面，说明虽然战场形势不利，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金山国、属于握有龙泉神剑的金山天子的；不必因为战场形势一时不利便感到气馁，而应坚定信念，奋力抗击来犯之敌。”^③杨宝玉认为：“是由金山国宰相张文彻创作的一首上千字的长诗，内容大致上包括赞颂、建议、憧憬等几个方面，其中赞颂部分既有对张承奉本人的吹捧，也有对甘州抗击回鹘的金山国战将的歌颂，而后者乃是这首长诗中写实成分最多或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④综合起来看，这首诗是归义军时期金山国建立以后第二年所产生的作品，是敦煌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诗中描写了金山国抗击回鹘的战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尽管敦煌本诗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但这首超过千字的长篇歌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敦煌诗歌的繁盛状况。

①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

②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敦煌遗书论文集》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

③ 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的评价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56-60页。

④ 杨宝玉《金山国时期肃州地区的归属——以法藏敦煌文书P.3633为中心的考察》，《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7-158页。

二、吐鲁番文书：丝路重镇的唐诗印记

新世纪吐鲁番写本文献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文学艺术、民风世俗得以凭借的最为原始的材料。新出吐鲁番文献中还有不少唐代类书的残片，这些写本残片大多是遗佚的类书片断，也是我们研究唐代学术与文学关系珍贵材料。朱玉麒先生将这些残片定义为“碎片模式”：“在整个中古时期，吐鲁番文书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意义，更因为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接受的通性。其‘碎片模式’在中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创立中，便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价值。”^①就唐诗而言，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最为原始的唐诗印记。

（一）吐鲁番文书中的岑参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文书，其中阿斯塔那墓506号张无价墓纸棺上的马料帐，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非常珍贵的是，其中记载了大诗人岑参的两则材料，以及有关岑参诗中的人名、地名等材料，是我们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文献。

阿斯塔那墓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三——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中。其中有关岑参的直接资料有两条，一条见于《唐天宝十四载某馆申十三载三至十二月侵食当馆马料帐历状》

□[坊]帖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叁斗伍胜，付健儿陈金。

一条见于《唐天宝十四载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踏历上郡长行坊状》：

郡坊帖马陆匹，迎[岑][判]官，八月廿四日食麦肆斗伍胜，付马子张什作。^②

马料帐上的“岑判官”就是岑参，他担任封常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来往于北庭与交河之间，写过不少歌颂战争和描写边塞风光的诗篇，而这一马料帐就是留存于今的最有价值的印记。

岑参从军于西域边塞，来往于中原与西域之间，诗中涉及的人物很多，尤其是他的几首长篇歌行的边塞诗，实际上都是在西域的唱和之作，因此，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人物，有一些就可以与岑参的边塞诗相印证。这里大约有封常清、李栖筠、武判官、崔复、王伯纶、张子奇、刘单等。现举封常清为例加以说明：

岑参诗中涉及之人，在马料帐中经常见到，见得最多的是封常清。其最具代表性的长篇歌行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两首诗都是天宝十三载九月岑参为封常清安西节

① 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82-194页。

②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

度判官时所作。岑参诗歌颂封常清战功的诗作，还有《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纳凉》《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等诗。

有关封常清的原始文献，最早也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马料帐。总共有二十八条，如《唐天宝十四载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踏历上郡长行坊状》：

郡坊迎封大夫，马肆拾捌匹，四月廿四日餽科粟貳硕肆斗，付槽头张瓌，□□□□乘。（第423页）

郡坊迎封大夫，□马肆拾匹，八月廿七日食麦貳硕，付马子兹秀（元）。押官李俊卿。（第425页）

二日，帖马柒匹，便迎封大夫，食麦渠斗，付吕承祖。（第429页）

十四日，郡坊后迎封大夫，粗细马伍拾贰匹，食麦貳硕，……头魏秀琳。

北庭送封大夫，征马贰拾匹，送至柳谷回。十一月十八日，食青麦貳硕。（第430页）

因为集中于封常清有二十八条，就说明在天宝十三载和十四载，封常清经常因为军事的需要来往于交河的。在记载封常清的马料帐中，还有两条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唐天宝十四载某馆申十三载四至六月郡坊帖马食踏历状》这一写本记载封常清事有九条，其中第一条云：

三日，郡坊马十四匹，送封大夫娘子银册回，食麦粟一石，付马子陈阳、赵瑾。^①

另外就是《唐天宝十三载碯石馆具七至一闰十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这一写本涉及封常清事有五条，其中第一条云：

同日，郡坊帖马两匹，天山馆送封大夫女婿杨郎到，食麦一斗，付天山马子赵宾。^②

这些都是封常清加封御史大夫后的文卷，都是在天宝十三载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第一条“送封大夫娘子银册回”，说明达到封常清这样主帅的级别，军中是可以携带夫人的。这在新出土的马料帐中仅此一处，然这一记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爱的唐代军队设置与主帅生活的信息。而“天山馆送使封大夫女婿杨郎到”，也说明封常清担任安西节度使时，全家包括女儿女婿都是随其在军中的。唐朝将帅在军中的生活，于此可见一斑。这些材料对于理解岑参与封常清的往来诗歌都非常重要。

岑参是唐代从军西域的最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对于西域具有全方位的表现，故而涉及到很多地点。吐鲁番文献中记载的一些地名，是印证岑参诗的最原始的文献。由这些地点与岑参诗相对比，可

①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527页。

②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51页。

以进一步了解岑参诗所表现的西域风土人情，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这些地名有银山碛、赤亭口、天山馆、苜蓿烽、瀚海等，这里举银山碛为例：

岑参有《银山碛西馆》诗：“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①这里的银山碛在马料帐中多处见到。

《唐天宝十四载某馆申十三载四至六月郡坊帖马食厝历状》：

廿九日，郡坊帖银山马廿匹，过封大夫，并全食麦粟两石，付健儿郭运、陈金。

卅日，郡坊帖碛石马廿匹，过封大夫，食麦粟两石，付健儿郭运。

同日，郡坊帖银山马廿七匹，过封大夫，食麦两石七斗，付健儿党奉起、张瑰。^②

《唐天宝十三载碛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

同日，郡坊帖马十六匹，从银山送刘大夫到，内六匹全料，共食麦一石一斗，付赵瑾。^③

同日，史将军乘银山馆郡坊帖马两匹，食麦一斗，付马子吕承祖。^④

同日，郡坊帖银山马十三匹，及先送使收回等，共食麦六斗五升，付马子丁光。（第449页）

同日，郡坊细马四匹，帖银山迎赵光烈，食麦四斗，付马子杨景秘。^⑤

《唐天宝十三载碛石馆具七至十二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

同日，郡坊帖马两匹，天山馆送封大夫女婿杨郎到，食麦一斗，付天山马子赵宾。（第451页）

同日，郡坊马□匹，帖银山迎封大夫，食麦一石五斗，付健儿张俊。

同日，郡坊帖马五十匹，从银山送封大夫到，食麦四石，付健儿张俊。^⑥

《唐天宝十四载某馆申十三载四至六月郡坊帖马食厝历状》：

廿四日，郡坊马帖银山馆马十三匹，迎赵都护，食麦粟八斗，付健儿上官什忤。^⑦

同日，郡坊帖银山马一十三匹，送赵都护到，便向天山，食麦一石二斗，付健儿上官什忤。^⑧

① 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卷二，第386页。

②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528页。

③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47页。

④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48页。

⑤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53页。

⑥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52页。

⑦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527页。

⑧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528页。

《唐天宝十三载碯石馆具七至十二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

同日，郡坊马十四匹，送赵都护家口，从银山到，便腾向天山，食麦一石四斗，付张延福。^①

岑参诗中的“银山碯”和马料帐中的“银山”都是指银山驿站，现在的铁门关中还有“丝路驿站”应当就是唐代的银山碯遗址。银山碯在银山道上，银山道据《西州图经》残卷称：“银山道，西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②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记载银山道云：“一为驿道，即今大道。吐鲁番西行，经布干台、托克逊，折西南行，至苏巴什入山，经阿哈布拉克、桑树园子、库米什出山，折西行，入焉耆界。经榆树沟、新井子、乌沙克拉、曲惠、清水河西至焉耆，共十一站，八百四十里。”^③我们以岑参诗、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及相关地志相印证，就能够更好地落实诗歌所表现的地理因素，更好地研究人物、时间、空间与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吐鲁番出土的儿童习字诗

吐鲁番出土的唐诗写本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是弥足珍贵的。如儿童习字诗残片^④，是唐时抄写的隋代岑德润《咏鱼》诗，每字抄写多达三遍，参以吐鲁番以及和田地区出土的其他五言诗残卷以及《急就章》《千字文》等蒙学教材，证实中原文学和文化对周边教育具有很高的启蒙价值，也反映出唐代吐鲁番地区以诗歌作为启蒙教育载体的教育方式。此外还可以通过这一写本考察吐鲁番的文化习尚变迁。这一习字诗残片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首先是将岑德润诗作为范本反复临写，具有范本的意义。而这样的重要背景是唐代朝野对于诗歌的爱好。因为唐朝自太宗以来，几代君主如高宗、武后、中宗等都热衷诗赋，在全国形成风气。西州自贞观十四年被纳入唐代版图以后不久，就将这样的风气传入，而将诗歌作为范本来学习。其次，吐鲁番出土的《咏鱼》诗习字残片，体现了唐朝初年趋向南朝诗风的文学趣味。因为岑德润的《咏鱼》诗，主题琐屑而词采华美，对仗工整，以此作为范本，说明唐初崇尚的诗风是南朝化的。^⑤

在吐鲁番出土的儿童抄写的诗歌中，还值得注意的是1969年阿斯塔那墓263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西州学生卜天寿抄录的《〈论语〉郑氏注残卷》后所附五言绝句六首。卜天寿时年十二岁，在西州抄写《论语》郑氏注，并抄有五言绝句六首，其一云：“书写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日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这就说明唐代是在西州设立州学的，其中有教书的先生，也有在读的学僮。卜天寿就是学僮之一，他学习的对象是《论语》，故而要做抄写《论语》的功课。抄写之余，抄了几首诗。除上引第一首外，如第四首“高门出己（杰）子，好木出良才（材）。交口学敏（问）去，三公河（何）处来”，这首诗带有治学箴言性质，透露的是儒家思想。卜天寿抄录的诗中，还有一首是带有箴言特点的

①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48页。

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③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④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6页。

⑤ 参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文物》2007年第2期，第64页。

《十二月三台词》六言诗：“正月年首初春，[万户]改故迎新。李玄（李弦）附灵（抚琴？）求学，树夏（下）乃逢子珍。项託七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相）秦。[若]无良妻解梦，冯唐宁得忠辰（臣）。”^① 这些诗至少能够说明当时西州的教育儒学与文学是有相互关联的。

不仅如此，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出现《论语》《孝经》《礼记》《经典释文》《典言》《韵书》等，可以看出以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非常重视儒学教育。正如葛承雍先生所言：“从这些学童读本可以看出，当时儒家教育中既有传统的识字教学（形音义），又有诗歌教学（读写作），符合中国汉字文化的教学规律。《切韵》教孩子作诗合韵和押脚韵技巧，《典言》叫小孩说话用语文雅，儒家经典让学童知道仁义礼智信。如果我们将吐鲁番出土的卜天寿抄本放在7-9世纪唐代儒家文化兴盛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就可以明瞭唐诗繁荣与文化发展的原因，这就是学童教育基础很广泛、很扎实、很成功。”^② 葛先生认为唐代西域儒学教育一点不比中原落后，虽然可能有些夸大西域教育的实际情形，但从他对西域教育进行分析的各个层面来看，还是可以看出中原教育对于西域教育的影响的，中原儒家文化对于西域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原诗歌传播至西域也促进了西域文学的发展，从吐鲁番儿童习字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唐诗繁荣的基础在于从学童开始的诗歌教育。

（三）吐鲁番出土的唐玄宗诗

吐鲁番出土的另一个重要唐诗印记是唐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③，说明诗歌通过唐代帝王的提倡，其影响已经到达了西域，这样的诗歌传播融会了政治与文学，缩短了长安与西域的文化距离。玄宗诗歌作为范本而接受，因为政治而流传。从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提醒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区别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关注非文学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于文学影响的存在。朱玉麒说：“由君主的热衷诗赋而带来文学爱好的上行下效，从而使天下靡然成风，最终导致了诗赋取士国家制度的实行，这就是唐初一百多年内由太宗而高宗、武后、中宗、玄宗几代君主始终不变的‘政治关怀’。当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御制的《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和反映玄宗天宝元年（742）行幸骊山温泉宫与群臣诗赋唱和的佚名《驾幸温泉宫赋》出现在吐鲁番文书中时，再没有比这更能证明‘政治的文化’与‘文学的时尚’合谋的影响了——它使吐鲁番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也汇流到了唐代文学思潮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直到9世纪初新的历史变动出现。”^④ 由玄宗诗残片的发现与朱玉麒先生的缀合，至少启发我们有四点认识：第一，玄宗诗在吐鲁番发现，说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文化较为广泛地影响到西域。这当然不仅是文学因素，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也就是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设置西州之后，中原文化对于西州具有强有力的熏染。第二，玄宗诗传播到西州之后，成为士子学习的范本，参以儿童习

① 卜天寿所抄五言绝句及《十二月三台词录》录文，据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② 葛承雍《唐代西域儒学教育一点不比中原落后》，刊载凤凰网国学 https://guoxue.ifeng.com/a/20160525/48844630_0.shtml。

③ 参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76页。

④ 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93页。

字诗中重复抄写隋朝岑德润的《咏鱼》诗，说明初盛唐时期的西州教育已经具有明显的汉化特征，唐代西域设立庭、西、伊三州，与其所建置的安西四镇，在文化传播的程度上是明显不同的。第三，吐鲁番发现的是玄宗诗而并不是其他更为著名的文学家之诗，毋庸置疑，这是唐代皇权的影响力使得文化向西域延伸，向边地扩展，对于西域而言，唐帝国军事的征服与文化的同化是并行的。第四，吐鲁番玄宗诗残片的发现，也为唐诗的全面繁荣提供了佐证。由玄宗诗影响到西州，说明唐诗的普及已经到了边远地区，既然如此，其他地区普及与影响更是可以推而论之。唐代皇帝对于诗歌的亲力亲为，加以皇权的影响力，对唐诗的繁荣推动力是巨大的，也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三、安西四镇：西域唐诗的边缘活力

在唐代的繁盛时期，中央和地方以至边疆，一直处于交融的状态，作为中央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政治、经济也是文学核心的长安，体现了文化凝聚的特征，而这样的文化凝聚并不是局部的和单向度的，而是全局的和辐射状的，核心地区以外的边缘活力与文化中心也形成交融和碰撞，因此，唐代文学史研究既要注重核心地区的文化凝聚，也要激发中心以外的边缘活力。在边缘活力促进唐诗的发生与传播方面，安西四镇是非常典型的。唐太宗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后，建立西州，并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进驻龟兹，就将安西都督府迁往龟兹城，并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建置军镇，受安西都护府管辖，称为“安西四镇”。唐高宗调露元年，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后筑碎叶城，就将碎叶代替焉耆，成为安西四镇之一。但安西四镇与西域的西州、庭州、伊州不同，西州、庭州、伊州是唐太宗平定高昌后设置的州郡，建置与内地州郡相同，安西四镇则是唐代而西域设立的军镇，而其地则是民族高度自治的地方王国。

（一）龟兹

龟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明古国，是唐五代时期域外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心之一，也是对唐五代文学的发展颇有影响的独特地域。在唐代，龟兹是安西四镇的首要重镇。大唐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龟兹的繁荣，龟兹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机缘。龟兹是音乐与佛教兴盛之地，相关的音乐与舞蹈直接融注于唐诗之中，使得唐代的乐府诗与声诗盛况空前。

音乐方面，《乐府诗集》即有《燕射歌辞》一类，解题称：“唐武德初，宴享承隋旧制，用九部乐。贞观中，张文收造宴乐，于是分为十部。后更分宴乐为立坐二部。天宝已后，宴乐西凉、龟兹部著录者二百余曲，而清乐天竺诸部不在焉。”^① 龟兹音乐是唐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教坊曲中的一些曲目词牌名称即是根据龟兹乐部而来。如教坊曲《苏幕遮》就来源于龟兹舞曲；教坊曲《破阵子》的早期乐曲是龟兹部所作的《秦王破阵乐》；《春莺啭》本由龟兹乐工谱曲，诗人作诗以描述，后来转化为词调。作为音乐组成部分的龟兹乐器，据《新唐书·音乐志》记载，即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篪、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弹箏、候提鼓、齐鼓、檐鼓等二十余种。唐诗中对于这些乐器的表现更是不胜枚举。

^①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2页。

舞蹈方面,龟兹舞蹈有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这些舞蹈,或直接出于龟兹,或在龟兹文化影响下带有西域特色而传入中原,为中原士人所喜爱。唐代诗人将其表现于笔端,惟妙惟肖。如白居易有《胡旋舞》《柘枝妓》《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和同州杨侍郎夸柘枝见寄》,刘言史有《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李端有《胡腾儿》,殷尧藩有《潭州席上赠舞柘枝妓》,元稹有《胡旋女》,刘禹锡有《观柘枝舞二首》,薛能有《柘枝词三首》,李群玉有《伤柘枝妓》等。张祜集中描写柘枝舞的诗作甚至有多首:《李家柘枝》《赠柘枝》《观杭州柘枝》《观杨媛柘枝》《周员外席上观柘枝》《感王将军柘枝妓殁》《寿州裴中丞出柘枝》。

佛教方面,龟兹是佛教由印度传播到中土的重要站点。到了唐代,龟兹更进入佛教发展的全盛期。现在仍然存在的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托乎拉克艾肯、台台儿、温巴什、玛扎巴赫等佛教石窟群,就是龟兹佛教繁盛的见证。龟兹人鸠摩罗什在佛教东传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称为佛教八宗之祖。龟兹佛教对于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影响巨大,诸如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对于佛经的研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①,王维取字“摩诘”与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应该有所关联,鸠摩罗什的汉译佛经对王维诗文意象的塑造、佛理的阐发,以及思想和情感的表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鸠摩罗什译经对于名相的辨析以及本土优势的发挥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引导了王维的佛理接受和阐释,译经之外,鸠摩罗什所作的三首偈颂和《十喻诗》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 碎叶

在唐代西域与边镇的历史上,碎叶城尤为重要。唐代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出玉门关,抵伊吾沿天山北麓,过庭州、轮台、热海,西至碎叶,称为“丝路北道”。它是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集结的交通要冲。唐高宗调露元年于此设立军镇,作为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四镇之一。这里作为军事重镇,20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作为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重镇,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才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碎叶城与唐诗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不仅在于唐诗当中不少是对于碎叶的吟咏,如大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有“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②一诗。我们在唐代大诗人当中,可以选取两位诗人作为实例进行考察。

一位是初唐诗人骆宾王。骆宾王诗中并没有直接提到“碎叶”的地名,但他在调露元年随裴行俭平定西突厥至碎叶城,留下了几首诗作。薛宗正先生以为骆宾王《在军中赠先还知己》和《久戍边城有怀京邑》是在碎叶所作,诗中“边城”即指碎叶。^③这一说颇为合理。因张说所撰《裴行俭神道碑》载其平定西突厥,最后以在碎叶立碑告终,因而这一事件必有与碎叶相关。裴行俭于调露元年出征碎叶后,即

① 鸠摩罗什佛教对于诗人王维影响的研究,可以参考屈玉丽博士的系列论文:《论鸠摩罗什译经对王维的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论鸠摩罗什译经中的情节设置与王维涉佛诗文的构思》,《北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论鸠摩罗什译经中的文学想象对王维诗文创作的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鸠摩罗什论“空观”的遮诠双遣方式对王维诗文的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论王维诗文中对鸠摩罗什译经“譬喻”的运用》,《海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② 《全唐诗》卷一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44页。

③ 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将碎叶设立为安西四镇之一，故而留王方翼在此筑城。骆宾王在碎叶滞留时间较长，故作了《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诗，称“献凯多惭霍，论功几谢班”^①，是说裴行俭功成班师回朝。而“胡霜如剑锷，汉刀似刀环。别后边庭树，相思几度攀”，则是自己尚留在碎叶而赠送先还知己之语。故而其《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之诗就是作于碎叶，诗题“边城”就是碎叶城。因此，在碎叶城开始建筑并确定为安西四镇之一的时候，骆宾王就是第一个从军并在碎叶城留下诗作的诗人。

一位是盛唐诗人李白。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是研究安西四镇与唐诗关系的最为典型的实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易名。”^②这是李白先世流于碎叶的最早记载。李白出生于碎叶，虽然在其童年时代随父到了蜀中昌隆县即今四川江油县，但因为其家世的影响与童年西域的经历，胡风和胡气在他的诗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就是诗中呈现出浓厚的西域文化色彩。“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③，展示出辽阔的边塞图景；“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戎削风骨。貌玉灵昊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两临上唇”^④，描摹出康国胡人的独特面貌；“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⑤，对于西域所产的美酒与酒器非常珍爱；有时直接将自已家乡确定在西域：“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⑥。值得重视的是，李白因为与碎叶城的渊源，使得他对于西域的一些独特语言具有较深的了解，这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是他懂得当时的“月支语”，其《寄远十二首》诗有“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语。寄书自鸚鵡，西海慰离居”^⑦之语，这是碎叶的渊源在李白身上留下了的印记又在诗歌中表现出来。二是他“草答蕃书”，范传正在《李公新墓碑》中说：“天宝初，召见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辍。”^⑧这也是李白通晓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

（三）于 阆

《旧唐书》记载：“于阆国，西南带葱岭，与龟兹接，在京师西九千七百里。胜兵四千人。其国出美玉。俗多机巧，好事祆神，崇佛教。”^⑨贞观二十二年，唐军攻灭龟兹后，在于阆建置军镇。因为于阆处于蕃汉交界之地，其后又不断为吐蕃占据，军镇时置时废。于阆的古代居民属于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唐朝虽然于此设立军镇，而其统治仍然属于自治地区，这与唐太宗平定高昌后设置西州完全不同。与龟兹和碎叶相比，安西四镇中于阆和疏勒所留下的唐代文学印记就很少。但因为唐代开国时即奉行“胡、越一家”的立国方针，兼顾了唐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开放兼融的特性，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阆，

① [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② [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太白全集》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61页。

③ [唐]李白《关山月》，《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19页。

④ [唐]李白《上云乐》，《李太白全集》卷三，第204页。

⑤ [唐]李白《对酒》，《李太白全集》卷二五，第1179页。

⑥ [唐]李白《江西送友人入罗敷》，《李太白全集》卷一八，第859页。

⑦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二五，第1167页。

⑧ [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太白全集》卷三一，第1461页。

⑨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05页。

当然会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

大诗人李白《于阕采花》诗云：“于阕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齿。”^①《于阕采花》属古乐府曲，《古今乐录》云：“《于阕采花》者，蕃胡四曲之一。”^②这一乐曲是古代于阕国传至中土的乐曲。这首诗是运用《于阕采花》的乐曲以描写昭君出塞之事。由花的不同引出胡汉美的对比，通过为昭君鸣不平而透露出自己怀才不遇的身世之叹。李白诗比起陈隋之作如无名氏的《于阕采花》诗“山川虽异所，草木尚同春。亦如溱洧地，自有采花人”，无论是内涵与还是艺术上，都要丰富得多，成熟得多。这也说明到了唐代，对于于阕乐曲的运用在前代文人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于阕是古代的佛教王国，佛寺甚盛。以至贞观十八年，玄奘由印度取经归国，路经于阕受到于阕官员的热情接待，并护送去敦煌，再回长安。于阕佛寺所悬的大钟尤为著名，也就成为佛寺梵钟的代称。窦庠《于阕钟歌送灵彻上人归越》，这是描写于阕钟最为详尽的诗作。此钟因为钟面有着九个乳头状饰物，故又称“九乳钟”。接着描写钟的声音，冲澹和平，能够感动神灵。再写集东南之美的灵嘉寺，钟声响起，洞彻八音，以致万籁俱寂。诗以七言歌行以描写山寺钟声，既表现出钟声传播的流动感，又透露出寺钟声的神秘性，成为古今描写于阕钟的佳制。灵一《静林精舍》诗云：“静林溪路远，萧帝有遗踪。水击罗浮磬，山鸣于阕钟。灯传三世火，树老万株松。无数烟霞色，空闻昔卧龙。”^③诗的颌联以“罗浮磬”与“于阕钟”对举，以表出佛寺的庄严和隆重。“击磬”“鸣钟”以动衬静，表现出山寺恬静清肃的禅意境界。刘复《禅门寺暮钟》：“簏簏高悬于阕钟，黄昏发地殷龙宫。游人忆到嵩山夜，迭阁连楼满太空。”以七言短章写出禅门寺黄昏时于阕钟声，震动龙宫，更使游人联想到嵩山少林寺钟声迭阁连楼，响彻太空的情景。

甚至于唐代科举考试的省试诗当中，也有于阕典故的运用。郑蕡《天骥呈材》：“曾邀于阕驾，新出贰师营。”^④郑蕡咸通三年登进士第，《天骥呈材》就是该年进士试的诗题。唐黄璞《王郎中传》：“咸通三年郑侍郎从谏下进士及第，试《倒载干戈赋》《天骥呈材诗》。”^⑤是年登第作是诗留存者还有王桀、徐仁嗣、卢征三人。于阕之马也是西域名马，而且在汉代即颇受重视。西汉张骞、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后，于阕地区曾流通一种货币，正面为马形图案，四周有少数民族文字，圆形无孔，称为“和田马钱”。诗用“于阕驾”的描写天骥，是对于阕马的名贵。

唐人诗作在写景的时候，也常常以于阕的风物进行衬托。贯休《遇五天僧入五台五首》，诗写天竺僧人从西域万里而来，入五台山游访，故而有“河横于阕北，日落月支西”之句，这是诗人想象中的壮阔之景，也是僧人来时的所经之路。故而将现实与想象结合在一起，将与僧人相遇的情怀呈现出来。清昼等人的《远意联句》，诸人在联句时也会想象到于阕：“家在炎州往朔方，岂知于阕望潇湘。”^⑥这是

①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30页。

② [元]萧士贇《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498页。

③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八〇九，第9124页。

④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七八〇，第818页。

⑤ [清]董诰《全唐文》卷八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03页。

⑥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七九四，第8936页。

东南西北辽远空间的对比，“于阗望潇湘”是“远意”的种呈现，于阗作为西面的端极，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较为特殊的是韦元甫《木兰歌》，描写木兰从军之事，其中有“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袭燕支虏，更携于阗羌”^①之句，描写木兰转战疆场，在燕山夜袭过支族的胡虏，在于阗俘虏过羌族的敌人。

（四）疏勒

疏勒国为汉初三十六古国之一，是古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的汇合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在交河设立安西都护府。二十二年，攻灭龟兹，将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又从西突厥手中夺回了疏勒、于阗、焉耆，修筑城堡，建立军镇。因为疏勒城为西域之要塞，唐高宗上元二年（675）还设立了疏勒都督府。成为唐王朝在疏勒既设军事机构又设行政机构的地方。

疏勒因为处于安西四镇的边远之地，在唐代，其本土出现的诗作并不多，抑或是很少存留下来。其与唐诗的关系，主要是从军边塞诗人的描写以及对于汉代有关疏勒典故的运用。然而，唐代的疏勒在西域还有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天山以北的疏勒城，位于今天的奇台县境内。但因为西域遥远，远赴西域的诗人们作诗提及疏勒或没有到过西域的诗人用疏勒的典故或想象疏勒，并没有将唐代安西四镇的“疏勒”和疏勒城的“疏勒”截然分开，后世学者对于诗歌笺释也大多将疏勒城的“疏勒”注释为安西四镇的“疏勒”。下面我们就将涉及“疏勒”的唐诗进行大致的梳理。

就边塞诗人而言，骆宾王有《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诗，其中有“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连营去去无穷极，拥旆遥遥过绝国。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疎勒”^②之句，清人陈熙晋注即引《汉书·西域传》及《唐会要》以为诗中“疎勒”即是贞观时期内附的疏勒国。骆宾王从军西域，一直到达极西部的碎叶城，因此这首诗中的“疎勒”即是安西四镇的疏勒。诗写从军西域，行军虽极苦寒，但从壮阔的边塞景色和悲凉的行军场中，还是透露出威武之英气，诗的风格也是豪放中见壮丽。岑参有《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岑参从临洮启程过兰州，接着就向武威，赴西域而再到疏勒。“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二句是说轮台那里白草向西通到疏勒，而我现在已经越过青山经过武威，正向轮台、北庭之地进发。

就典故运用而言，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有“拜井开疎勒，鸣桴动密须”^③之句，“疏勒”用耿恭事，《东观汉纪》“耿恭”条载：“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来攻，绝其涧水。城中穿井十五丈，无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恭曰：‘闻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而飞泉出，今汉德神灵，岂有穷乎！’乃正衣服，向井拜，为吏请祷，身自率士负瓮，有顷，飞泉涌出，吏士惊喜，皆称万岁。于是令士且勿饮，先和泥涂城，并扬示之。”^④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卷四注此“疏勒”为今人一般认为耿恭出征的疏勒为唐代庭州境内的疏勒城，不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但就诗作的整体而言，骆宾王这首诗是书写从军西域的情怀，其时作者在碎叶城，故而所用耿恭事是在疏勒城发生的，但其情

①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二七二，第3055页。

② [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卷四，第122页。

③ [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卷四，第129页。

④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3页。

怀理解为安西四镇的疏勒亦未尝不可。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王维的《老将行》，诗有“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①之句，这里纯粹是用耿恭的典故而作诗，因为这首诗基本上是通过历史上战功显赫的将领来衬托老将曾经的功勋，并不是要实指某地，因此，这里的“疏勒”就成为将领在西域之地立功的符号。皇甫冉《和袁郎中破贼后经剡中山水》诗有“节比全疎勒，功当雪会稽”^②之句，也是用耿恭的典故，是说袁俊郎中破贼之功很大，如同耿恭一样，坚守疏勒城，不受诱降，全节而归。唐代诗人有时还将有关疏勒的耿恭、范羌之典连用，如李端《雨雪曲》有“丁零苏武别，疎勒范羌归”^③之句。范羌是耿恭的一位军吏，据《后汉书·耿恭传》记载，范羌曾率二千人冒丈余之大雪从敦煌迎救校尉耿恭，到达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时仅余十三人。后来“范羌归”就成为冒险营救被困之人的典故。

四、西域文化融入长安的唐诗书写

唐太宗于贞观中击败东突厥后，将亡国后的突厥贵族迁移到长安，甚至还给一些贵族做官。龟兹、高昌、疏勒、吐谷浑等国的首领也在长安居住，甚至波斯萨珊王国灭亡后，国王卑路斯也带领很多贵族居住长安，因而长安就居住着众多的西域人口，文化交流与融合也就成为常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言长安之西域文明大要有“流寓长安之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西域传来之画派及乐舞”“长安打毯小考”“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长安西域人之华化”七个方面，这样就呈现出长安是多种文化融汇的国际都市。西域文化在长安的盛行，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居住在长安的西域人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而逐渐华化。而我们这里选取与唐诗密切相关的音乐、舞蹈、妆饰加以讨论。

首先，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融合，促进了唐代音乐的发展与变化。唐太宗平高昌，得其乐部，遂将原有的九部乐增加为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十部中七部是西域音乐。元稹《连昌宫词》：“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谟擪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涂路中。”^④将西域音乐流行于长安的情况，表现得非常生动。唐代诗人利用胡族音乐以入诗者常常见到。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有“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⑤天宝七载，诗人在长安送颜真卿奉使河陇，故将长安与西域的一些情事联系在一起。由这首诗也可见岑参对于西域文化的了解和向往。再如顾况有《李供奉弹箜篌歌》，李贺有《李凭箜篌引》，杨巨源亦有《听李凭弹箜篌》，描写的是西域音乐箜篌，

①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增订本）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61页。

②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二五〇，第2823页。

③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二八五，第3242页。

④ [唐]元稹《元稹集》（修订本）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1页。

⑤ 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0页。

而弹奏者是当时堪称国手的李凭。李颀有《听安万善吹箏箜篌歌》，描写的是西域安国人安万善流寓长安时吹箏箜篌的情况。

有些西域乐人流寓长安等地以至于终老。戴叔伦《赠康老人洽》诗就是描写了歌者康洽的一生。他少小就来到长安，为宫廷演奏，而且受到皇帝的喜爱。在长安多年，每逢秋暮，望月临风，思乡心切，但不知乡在何处，只有在长安终老。李颀也有《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有“识子十年何不遇，只爱欢游两京路”^①语，是康洽踪迹主要在长安与洛阳，其时与李颀已相识十年。李端《赠康洽》诗有“黄须康兄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②语，也是说康洽在长安出入王侯之宅，从少年到白头的经历。这也可以说明西域胡人对于长安的喜爱，而国际性的大都市长安也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长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很密切的程度。

其次，中古以来，西域的舞蹈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到了唐代，长安的西域舞蹈已经十分繁盛。而在诸多舞蹈之中，以《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最为著名。

胡旋舞是出于西域康居的舞蹈。《通典》曰：“《康国乐》，二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裤褶。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钹二。”^③根据敦煌莫高窟 197、215、220、241 窟出土的舞伎壁画，以及盐池唐墓石门的图画，胡旋舞应该是在小圆毯子上跳舞。白居易《胡旋女》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④元稹《胡旋女》诗亦云：“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笄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⑤从诗中可以看出，胡旋舞以旋为主，如同旋风疾驰、火轮炫目、骊珠迸珥、流星飞逐，掣电流光。

胡腾舞是出于西域石国的舞蹈，属于健舞。段安节《乐府杂录》说：“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⑥唐诗中描写胡腾舞的诗作有李端《胡腾儿》和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胡腾》之作，后者之“王中丞”为镇冀观察使王武俊。李端《胡腾儿》诗描写胡腾舞的场面：“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揽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⑦说明跳舞者是来自凉州男子，肌肤如玉，尖鼻如锥，轻衫上卷，长带边垂。扬眉动目，脚踏花毡，珠帽编戴，红汗交流，最后是反手叉腰，如同弯月。这样的舞蹈与两京本土的舞

① [清] 彭定求《全唐诗》卷一三三，第 1351 页。

② [清] 彭定求《全唐诗》卷二八四，第 3238 页。

③ [唐] 杜佑《通典》卷一四六，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3729—3730 页。

④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1 页。

⑤ [唐] 元稹《元稹集》（修订本）卷二四，第 330 页。

⑥ [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8 页。

⑦ [清] 彭定求《全唐诗》卷二八四，第 3238 页。

蹈宽袍大袖者迥然有别，故而非常时尚，深受唐人喜爱。与胡旋舞比较，胡旋舞重点在“旋”，即旋转；胡腾舞重点在“腾”，即跳掷。

柘枝舞也是出于西域石国的舞蹈，属于健舞。陈旸《乐书》卷一八四《柘枝舞》条：“柘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用二舞童，衣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始为二莲花，童藏其中，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之雅妙者也。”^①卢肇有《湖南观双柘枝舞赋》是描写柘枝舞最为详尽的篇章，将舞前的准备、舞蹈的姿态以及作者的欣羡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则有拂林妖姿，西河别部，自与乎金石丝竹之声，成文乎云韶咸夏之数”，则是来源于西域，融合于华夏。柘枝舞在中唐以后更加流行，遍布京城与地方。白居易有《柘枝妓》诗，刘禹锡有《和乐天柘枝》诗，章孝标《柘枝》诗，都是表现胡腾舞的情景。诗有“只恐相公看未足”语，则是在长安丞相府观看柘枝舞。

再者，西域的妆饰在唐代流行于长安。《新唐书·五行志》有记载：“天宝末，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②陈鸿《东城老父传》云：“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③花蕊夫人《宫词》云：“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衬小腰身。”^④是写皇帝出行时，随驾宫女的着装是回鹘格调，骑乘的工具也是回鹘进贡到长安的骏马。白居易《时世装》：“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⑤这种时世妆又称“啼妆”，其妆面犹如悲啼之状，来源于西域。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啾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⑥这里写到了“胡骑”“胡妇”“胡妆”“胡音”“胡乐”，说明安史之乱以后到元稹作诗的时代，长达五十年时间的胡风东渐，使得胡妆、胡音、胡乐的流行。

五、结 语

美国学者薛爱华在《撒马尔汗的金桃》中说：“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⑦我们论述的丝路重镇，只是这漫长的丝绸之路上的几个节点，这几个节点作为丝路明珠的标志在唐朝对西域经营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唐诗的发展与传播上，也映现出唐诗气象的恢宏，以长安为核心的文化辐射与以西域为纽带的边缘活力相互影响和碰撞，促成了唐诗的繁荣。我概括为五点：

第一，在漫长的丝路沿线，出现了很多重镇，演绎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唐代最为繁盛，唐诗在

① [宋]陈旸《乐书》卷一八四，《四库全书》第211册，第829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9页。

③ [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95页。

④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七九八，第8978页。

⑤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第234页。

⑥ [唐]元稹《元稹集》（修订本）卷二四，第325页。

⑦ [美]薛爱华《撒马尔汗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丝路重镇的发生与传播，呈现出繁荣的盛况。其中，西域重镇的文化发展与交流尤为突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文明体系的融合结晶，民族文化的精髓汇聚，都在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独放异彩。西域重镇的建立与唐诗繁荣的进程适相一致。

第二，唐代诗歌从创作到文本，很多留存在或发现于西域重镇，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敦煌唐诗的多元融合，敦煌石室的发现，保存于敦煌的各种写本文献重新问世，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吐鲁番文书的唐诗印记，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有所不同，该文书主要出土墓葬，虽然这样的文书呈现出“碎片模式”，但也是难得的最为原始的资料，而其中一部分是唐代诗人和诗作所留下的最早印记；安西四镇边缘活力，安西四镇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盛况空前的，唐诗也在这样的交融环境中发生、发展与繁荣。这些都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诗歌的繁荣。

第三，唐代都城长安与西域重镇是唐诗发展中核心凝聚与边缘活力相互融会的综合体，以长安为核心的文化辐射与以西域为纽带的边缘活力相互影响和碰撞，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唐代是国际型的大帝国，故而各方人物汇聚于长安，共同创造出帝都的辉煌。这里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唐代文化巅峰成就的唐诗，以长安最有凝聚力，也最有辐射力。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而平生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时候是两次入长安，唐代大诗人王维、岑参、高适，他们的诗歌体现了大唐盛世鼎盛与繁荣，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他们的诗作既有长安繁盛的映现，又有西域文化的融会。就唐诗而言，长安的辐射不仅远及西域的安西四镇，更由丝绸之路的畅通，由东亚而传入欧洲，也由海上丝路的传播到达世界各地。

第四，集中体现西域文明的音乐、舞蹈和妆饰，诸如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传播流行于唐代京城和朝野上下，改变了唐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扩展了唐诗的题材范围，促进了唐诗与其他文学艺术类别的融合。即如安西四镇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盛况空前的，唐诗也在这样的交融环境中发生、发展与繁荣。即如龟兹是音乐、舞蹈与佛教兴盛之地，相关的因素直接融注于唐诗之中，使得唐代的乐府诗与声诗盛况空前。

第五，唐代大诗人不少都有出塞、游边的经历，与西域重镇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出生于碎叶，西域的表现成为李白诗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李白浓厚的西域情结；王维入幕于武威，使得他早年的边塞诗刚健雄浑，与其后期的山水田园诗风格迥然不同；岑参参军于安西，他描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的七言歌行，铸就了边塞诗史的最高峰；高适从军于河西，其诗歌表现出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这些一流诗人的诗作，促成了唐代边塞诗的极大繁荣。

当然，可以考察的能够表现唐诗的丝路重镇者还有很多，就目前中国境内而言，北庭故城留下的诗歌多达数百首，张掖、酒泉、固原、哈密都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重镇；就中国境外而言，四镇之一的碎叶已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极为著名的撒马尔罕作为草原丝路的心脏，唐代与此有着密切的交流，是研究唐诗所应关注的重要节点，还有就像唐高宗时期护送波斯王子一路经过的区域，所经行的丝路重镇，也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唐诗抑或唐代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展开丝路重镇与唐诗发展关系的研究，以至于进一步开展中古文学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附记：本文曾作为南洋理工大学“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系列讲座之一，2021年10月30日进行

线上演讲，评议人为浙江大学中文系陶然教授，根据评议与现场交流情况，又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感谢曲景毅教授的邀请，感谢陶然教授的评议！

Important Tow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Prosperousness of Tang Poetries

Hu Kex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mportant town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vast Western Regions, presenting the venerab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which was developing thousands of years. While those towns have necessarily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prosperousness of Tang Poetries, particular relevancy can be extracted,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Firstly, Tang Poetries blended with complicated fundamental local traits in Dunhuang. Secondly, Tang Poetries had left its impress upon documents in Turpan. Thirdly, Tang Poetries were influenced by exotic atmosphere in the four towns in Anxi Frontier Command, infused with new vigor and vitality. Finally, Tang Poetries written in Chang'an also integrated with culture of Western Regions, embodied in the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frontier of Tang Dynasty.

Keywords: Yimportant tow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prosperousness of Tang Poetries, Dunhuang, Turpan, the four towns in Anxi Frontier Command